

京师学术随笔



天光云影

文化史漫记

冯天瑜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师
学
术
随
笔



天光云影

文化史漫记

冯天瑜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 / 冯天瑜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5788-4

I. ①天… II. ①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485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TIANGUANGYUNYI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3

字 数：30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曾忆梦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前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笔者致力于中国文化史（侧重明清及近代文化）考析，所撰多论著式，也偶尔试写一点随笔，聊记所感，这是早年兴趣的延伸。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十四五岁的我喜读鲁迅作品，尤钟情于鲁迅杂文。那时家中有毛边本《坟》、《热风》、《华盖集》、《准风月谈》、《二心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等，常常随携阅览，竟至如醉如痴。大约在1957年春天，邻居关先生（一位中专语文老师，无子女）一次见我这个初三学生在读《准风月谈》，他观赏书本后叹曰：“难得，是毛边本！”随即又问：“这书名是何意思？”我一时语塞，关先生说，当年杂志编辑怕惹事，要作者“多谈风月，莫讲国是”，鲁迅以“准风月谈”名书，乃讥刺当年的文化专制。此后，关先生下班、我放学回家，一大一小的两人常在院子里指天画地，议论滔滔。记得关先生说，鲁迅的随笔达到中国

文学的一个极致，其对时弊的针砭，有些至今犹感真切。又说，鲁迅希望自己批评时弊的杂文“速朽”，但时弊难除，鲁迅杂文因而“不朽”。关先生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也仿佛领略到一点鲁迅杂文的奥妙。以后，每读鲁迅书，总想起关先生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兴致勃勃的宏议，连带悟到：貌似轻松的随笔，也往往藏有机锋，介入生活的力度并不下于鸿篇巨制。

鲁迅的随笔，且不论其内容的深邃、文笔的峭拔，即以书名的拟定，便令人叹赏。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著《中国小说史略》，又编《小说旧闻钞》，于文学史研究贡献巨焉，而高唤“革命文学”的成仿吾认定，这“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指鲁迅为“有闲阶级”，称其“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几年以后，鲁迅信笔回敬曰：“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遂将自己洋溢着战斗精神的文字“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其反讽之妙，令人绝倒，可谓随笔极品。

少时也喜读知识性、生趣化的随笔。记得家中有多种丰子恺漫画，不时浏览，连带着也阅读丰子恺的随笔集，其具体内容今多淡忘，然书名的来由却记忆犹新：1927年，丰子恺请师傅弘一法师（李叔同）为自己住所取名，弘一要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下平日喜欢的字若干，揉团撒在佛像前的供桌上，随取两纸团，打开两纸皆书“缘”字，于是丰子恺寓所命名“缘缘堂”。1931年丰子恺出版文集，题名《缘缘堂随笔》。“缘”“缘”二字直指佛学“因缘”精义；随缘而行，又正是丰子恺为人、为画、为文的特色。隐约记得，《缘缘堂随笔》有“自然”、“儿女”、“闲居”、“忆儿时”等篇，皆“缘缘”之作也！

域外学人的随笔，也不乏精彩之作。早年读英国思想家培根作品，其大块崇论宏议多已遗忘，唯记住这样一些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奇迹总是在不畏中闪现。”“安逸和满足易成为腐败与堕落的温床。”培根论“友谊”尤其充满睿智：“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如此妙语，怎能忘怀！

中年以来研习明清文化史，不免翻阅两朝小品随笔，从《草木子》、《见闻杂记》、《五杂俎》到《海外纪事》、《漫游纪略》、《巢林笔谈》皆曾泛览。明清随笔中，陈继儒《小窗幽记》透现的脱俗之气给我留下颇深记忆，尤欣赏“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的境界，友人书写此语，我张贴书柜至今。至于《围炉夜话》的书评卓见、《浮生六记》的人生感悟，也都启人心扉。

我喜好随笔那种洒脱无拘的笔法，颇景仰此一“自由文体”，然几十年来自己多从事学术论文写作，虽讨厌新旧八股调，尝自勉“陈言务去”，却难脱程式化窠臼。近20年来也曾试作随笔，意在挣脱高头讲章式的古板，然仍未能走出“论文”套路。今次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雅命，郭世佑教授敦促，编辑《天光云影》一卷，有的篇什近于随笔，有的篇什则是较短小的论文，读者慧眼可辨。

“天光云影”取自朱熹诗《观书有感》（之一）。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子以清澈如镜的池塘，比喻学习者应当具备的接受机制，有此机制，才能映照如天光云影般跃动着的鲜亮世界。而保持心智池塘的清澈如镜，须仰仗来源于历史及现实生活实践的活水源源不绝地供给。

赢得源头活水，让心智的镜鉴明澈，以映现大千世界的天光云影，是学者的必修功课，当然也是随笔包蕴生趣的源泉所在。

这本小书还收录十余年来我为长辈及同辈学者（不少已成古人）草绘的素描，其中留着这些师友某一瞬间的侧影与寄语，或许有点存史价值，又可稍微添补小书的生趣与灵动。

冯天瑜

2009年7月22日拟于武昌珞珈山麓

观数百年方得一见的日全食之后

目 录

国故平议

- 从梁启超对东亚传统的两极判断说开去 /3
- 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持平允态度 /10
- 多层次变革交会 /15
- “五伦”、“三纲”分梳说 /19
- 张之洞及其《劝学篇》/28
- 展示和谐精神的佳妙文化符号：太极图 /34
- 求教于传统生态智慧 /37
- 清官廉事 /44
- 略议时下清宫戏中的历史观 /46
- “软实力”小议 /51
- 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 /54
- 对当下国学讲习的期待 /62
- 重温缪凤林、费孝通的中国“封建社会”论 /70
- 从士人效忠对象的变迁看封建时代与皇权
时代的差异 /77

学海蠡测

“学术服务人类”与“为学问而学问”/85

修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词章/88

“首义第一枪”与历史考证/95

清史编纂体裁刍议/103

大学的天职/107

故宫盗宝案真相/110

辩才无碍/114

文星闪耀/118

旧曲新弦见沧桑

——《〈李自成〉精补本》感言/122

《徐九经升官记》创作及其他/129

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133

近代中国人对新语汇入华的“迎”与“拒”/142

侨词来归/164

乡关何处

中国文化的地域展开/181

近世鄂东人文兴盛原因探略/186

以史入诗 以诗证史

——《湖北竹枝词》的史学价值/192

先行者之歌/197

彩笔武汉/201

黄鹤楼揽胜/205

碑文（四篇）/208

汉口租界/213

精神家园/217

在记忆浅层底下 /224

高中忆旧 /228

异域采薇

城堡与封建制 /233

游马克思故居散记 /238

新加坡的成就与忧患 /244

新加坡：立法明，执法严 /247

绿意遍东瀛 /250

中国制造 /253

“敬业”二字好生了得 /258

勤劳感谢日 /260

伊原泽周先生赠书记 /265

中日汉字文化互动的回顾与前瞻 /270

检视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踏查 /285

“世界遗产”：不可再生的瑰宝 /296

奥林匹克两格言相得益彰 /304

师友序评

《明清文化史散论》序 /311

《上古神话纵横谈》序 /315

《人文论衡》序 /319

博涉旧闻 敏求新知

——喜读《中国文化史断想》/321

颇有奥义

——评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323

读《“封建”考论》/329

《“封建”考论》：破解一则现代寓言 /334

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 /336

学人剪影 /345



国故平议

从梁启超对东亚传统的两极判断说开去^①

东亚传统包蕴的内容极其丰富，视角各别、价值取向有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议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东亚传统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

一极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和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为代表。伏尔泰《风俗论》等著作将清朝的康熙皇帝视作柏拉图“哲学王”似的理想典范，他推崇中国的儒学，认为其中有当时欧洲现实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发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

① 本文系作者2008年在“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

“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伏尔泰对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等东方式智慧大加赞叹，并借以作为鞭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魁奈对中国文化也崇拜备至，有“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的名论。

另一极则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他们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如亚当·斯密《国富论》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李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中国称为“那个永无变动的单一”，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东亚智慧”的化身——孔子，视作“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东亚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其一极的表现是，蔑视中国文化的西方言论时时发自政坛、学界，并往往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交织在一起；另一极的表现是，对中国文化高度赞许，尤其将《老子》、《周易》奉为天书，以为是克服“现代病”的良药，甚或认为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词，往往发自西方一流思想家、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现代东亚人自身对东亚传统文化的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亚传统文化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亚传统文化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在同一位东亚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智慧的褒贬扬抑，往往也存在巨大反差。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20世纪初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和两

极化走势，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①。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②

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③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中国传统

①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见《饮冰室合集》，第5册，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合集》，第7册，121～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③ 同上书，126页。

社会及文化的不满溢于言表。

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勱（1887—1969）等7人赴欧，于旁观巴黎和会前后，遍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描述了这一情形：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援我们。”^①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唯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弯，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②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7册，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同上书，38页。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东亚智慧救中国论”，而且是“东亚智慧救世界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东亚智慧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截然背反的变化？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传统东亚文化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谋求现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现。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东亚社会及文化未能导引出现代化，其若干层面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梁氏从现代化诉求出发，揭露东亚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读来，人们也能产生会心之感。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观东方，发现东亚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东亚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是从后现代反思出发，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析，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身处现代文明之中，为“现代病”所困扰的今人读到此类评论，颇有切肤之感。

人们往往因梁启超1904年至1920年间的思想大转变而嘲讽他的“多变”，梁氏自己也曾以此类行径自嘲。其实，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巨子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我们今天对此种现象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对梁氏、严氏等前哲跳跃式思维的一般性批评，而应当进一步考析：

这种“大转变”、“大跳跃”报告着怎样的时代消息？今人应当从中